

# 1644至1911年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垦殖时空特征分析 ——以榆林金鸡滩乡为例

王 晗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 分析总结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土地垦殖过程及时空表现特征。结果显示, 由当地居民土地垦殖方式及力度变化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变化在整个清代呈现出较为平缓的发展态势。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土地垦殖可分为4个阶段: 明末清初的封禁期, 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六年的招垦期, 乾隆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禁垦期和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的拓垦期。大致从康熙中后期开始, 陕北长城外出现一定规模的汉族移民聚居点, 道光至光绪年间为土地垦殖的高峰期。进一步深入分析不同地域土地垦殖的差异性, 认为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在清前期以下湿草滩地、干滩地为主, 中期以下湿草滩地、干滩地、沙地居多, 晚期拓垦期与其他时期相比, 则以沙地为主。

**关键词:** 清代; 陕北长城外伙盘地; 土地垦殖; 时空特征; 金鸡滩乡

**中图分类号:** X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01(2006)03-0149-07

土地垦殖是人们改变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状况最主要的方式。深入细致地分析清代或过去数百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状况对认识今天的环境问题非常重要<sup>[1~2]</sup>。清代史籍, 尤其是方志资料中能够反映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信息庞杂, 提取可靠的数据进行甄别和鉴定, 则成为开展此类研究的重要基础和主要途径之一。本文以中国传统农牧交错带——陕北长城外地区为案例, 依据清代文献中记载的有关资料, 探讨该区域土地垦殖的过程及其时空特征, 复原清代本区土地垦殖变化的大致趋势。在此基础上, 重新审视该区生态环境演替的真实情况, 希冀该项研究对复原历史时期陕北长城外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有所裨益。本文所论及的研究区域位于蒙陕农牧交错带, 该区域是半干旱气候带向干旱气候带过渡的边缘地区, 常年受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 寒暑剧变, 起风沙的频率高, 农业生产对降水变化十分敏感, 可称为典型脆弱生境地带。同时, 本区在历史上长期以牧为主, 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加大, 农耕面积不断增加, 至清代, 山陕边民迫于生计, 越过边墙, “春出冬归, 暂时伙聚盘居”, 进行移民垦殖。经过垦殖的地域被称为伙盘地, 其范围如图1所示。

经过清代二百余年的移民垦殖, 该区域逐渐过渡到以农耕为主放牧为次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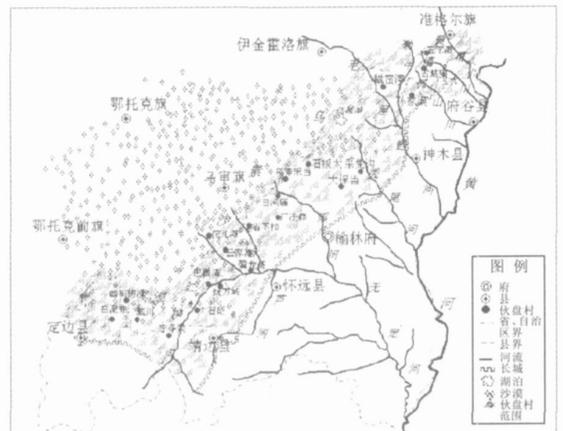


图1 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范围

Fig. 1 The sketch map of Huopan land at the outside of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 of Shaanxi in the Qing dynasty

## 1 土地覆被状况与土地垦殖类型

从生物气候带的角度来看, 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处于森林与草原的过渡带。由于受南北和东西温度差异影响, 特别是受非地带性风沙的影响, 以至草地植被空间差异较大。总体来看, 这里的植被可分为疏林草地、灌丛草地、草本植被草地三种类型<sup>[3]</sup>。这些草地类型在伙盘地的总体分布较少, 光绪末年, 有人在靖边县口外的城川口一带(今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作过调查, “(城川口)周围千里大约明沙、扒拉、硷滩、柳勃居十之七八, 有草之地, 仅十之二三”。

收稿日期: 2005-09-24

基金项目: 中国西部环境和生态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历代制度和政策因素对西部环境的影响, 途径、方式和力度”(90302002)

作者简介: 王 晗(1979-), 男, 山东德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历史环境变迁与重建研究。E-mail: wanghan1950@yahoo.com.cn.

其中,“明沙”和“扒拉”分别为流动沙丘、半固定沙丘。“硷滩”和“柳勃”则分别为盐碱化较严重的下湿滩地和干滩地。“硷滩”由于地下水位较高且埋藏较浅、排水不良,导致“土粗味苦,非碱非盐,百草不生”,盐碱化相对严重。而“柳勃”由于盐碱化较轻,

地表植被“似柳条而丛生,细如人指,长仅三五尺,夏发冬枯,蒙人仅藉以围墙,并作柴烧”,除此之外,该区域只有一些“硬沙梁、草地滩”。汉族移民针对这样的土地覆被状况,相应地采取了不同的土地垦殖方式,其土地垦殖状况如表 1。

表 1 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土地垦殖状况

Table 1 Reclamation land of HuoPan land at the outside of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 of Shaanxi in the Qing dynasty

土地类型 Land type	地貌状况 Physiognomy	作物、植被种类 Crop and vegetation	分布区域 Distribution
耕地 Cultivated land	草滩地 Bottomland	糜谷 Millet	沿边六县 Six county along Great Wall
	山地 Mountain region	糜谷 Millet	府谷、神木 Fugu, Shenmu
	沙地 Sandy land	沙蒿、沙蓬 Artemisia ordosica, squarrosium	沿边六县 Six county along Great Wall
	黄土残塬 Broken loess plateau	糜谷、荞麦 Millet, Buckwheat	府谷、神木 Fugu, henmu
撂荒地 Fallow land	草滩地 Bottomland	玉米、沙蓬 Meales, Agriopyllum squarrosium	定边、横山 Dingbian, Hengshan
	沙地 Sandy land	沙竹、沙蒿 Psammochloa villosa, Artemisia ordosica	定边、靖边 Dingbian, Jingbian
荒草地 Meadow	草滩地 Bottomland	沙蓬 Agriopyllum squarrosium	定边 Dingbian
	沙地 Sandy land	沙竹、沙葱 Psammochloa villosa, Allium mongolica	沿边六县 Six county along Great Wall
乔、灌木林地 Woodland	草滩地 Bottomland	榆、桐、杨、柳 elm, tung, Poplar, willow	定边、靖边 Dingbian, Jingbian

由表 1 可知,陕北沿边六县伙盘地的土地类型大致可分为四种,即耕地、撂荒地、荒草地和乔、灌木林地。由于伙盘地居民的耕作方式多为撂荒生产,因此,许多当年用于垦种的耕地在第二年则成为撂荒地。这些土地上的农作物多为耐寒、耐旱的糜、谷、荞麦。沙地中有部分土地可“……生黄蒿,名沙蒿,生既密,频年叶落于地,籍以肥田,如是或六七年或七八年,蒿老而地可耕矣”。但是随着移民的增加,土地的利用周期大为缩减,以至地力不足,弃耕现象严重。此外,伙盘地中尚存未开发的荒草地和乔灌木林地,这些土地生有沙竹、沙葱、沙蒿等草本植物和榆、桐、杨、柳等乔、灌木植物,但是乔、灌木林分散而稀疏,而移民的增加导致这些林木相应遭到破坏。

总的来看,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土地状况并不适合从事对土地和植被扰动比较强烈的农业生产,但由于移民的介入,沙质草地得以开垦,当被开垦的草地因气候干旱或土壤肥力下降而无法进行农业生产时,原有植被在未恢复前又不适于放牧,只好任其风蚀、沙化。当植被逐步恢复时,又由于土壤已粗化,植被的生产潜力和承载力下降<sup>[4]</sup>。移民对这片土地的经营恰好体现了农牧交错带农业化过程中土地垦殖的弊端。

## 2 土地垦殖阶段特征

为了揭示清代陕北长城外地区土地垦殖的真实过程,笔者选取榆林金鸡滩乡作为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依据文献中的有关记录,考察了对该区域有重大

影响的社会与自然事件、土地垦殖状况和伙盘地聚落点的增损情况,认为清代该区土地垦殖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明末清初的封禁期、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六年的招垦期、乾隆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禁垦期和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的拓垦期。

### 2.1 地理环境

金鸡滩原名金芟滩,清初分属于榆林常乐堡地方管理,至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成为榆林县北乡边塘十九村和东北乡双山堡地方八伙盘村的一部分。其北临神木县大保当乡,西、南与孟家湾、牛家梁毗连,东与麻黄梁、大河塔接壤,境域呈长方形,南北长 28 km,东西宽 14 km,面积 330 km<sup>2</sup>,占榆林总面积的 4.68%<sup>[5]</sup>。该区内地表为中细沙组成的沙地,沙丘呈不对称新月型分布。沙丘之间多为滩地,其中金鸡滩、柳卜滩、喇嘛滩等为榆林十八道滩中的名滩。这里地表水源较少,地下水资源丰富,有榆溪河支流二道河,该河源于金鸡滩片村东部,经上河村西流于牛家梁汇入榆溪河,境内流程 8 km。

金鸡滩乡土壤相对肥腴,且距离边墙较近,交通条件便利,早在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 1697 年)前后,便受到山陕边民的关注,而蒙古王公因利施导,将这片原属喇嘛封地的游牧地承租给前来就食的移民,汉族移民盘柳成宅,逐步成为当地的定居人口。

根据历史文献进行作图,可得到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六年的招垦期、乾隆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禁垦期和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的金鸡滩乡村落分布图。这四幅图深刻地勾勒出金鸡滩乡由单一的

畜牧业经济向半农半牧转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

反映了金鸡滩乡在各时期的土地垦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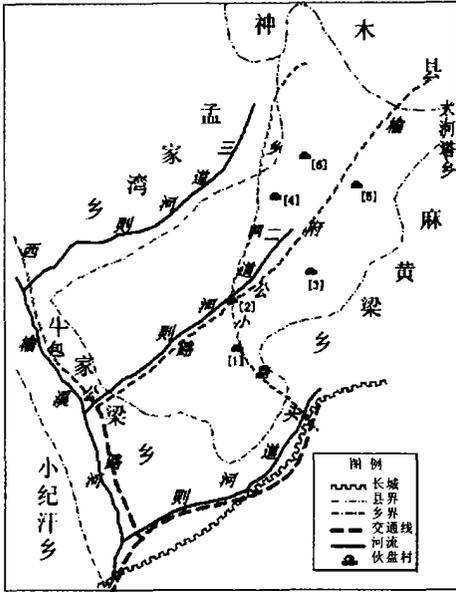


图2 康熙年间金鸡滩乡村落分布示意

Fig. 2 The sketch map of village distribution during Kangxi Emperor period

图2注:[1]-[6]为康熙年间所建村庄:[1]掌盖界[2]金鸡滩[3]柳卜滩[4]圪几盖滩[5]拉拉堡[6]白牛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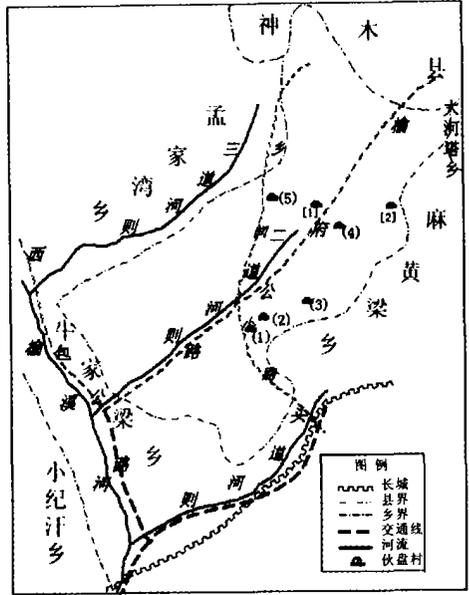


图3 乾隆至嘉庆年间金鸡滩乡村落分布示意

Fig. 3 The sketch map of village distribution from Qianlong Emperor period to Jiaqing Emperor period

图3注:[1]-[2]为乾隆年间所建村庄:[1]段家伙场[2]榆树湾;(1)-(5)为嘉庆年间所建村庄:(1)西窑则(2)南湾(3)羊脑滩(4)张寺梁(5)王家伙场。

图2注:[1]-[6]为康熙年间所建村庄:[1]掌盖界[2]金鸡滩[3]柳卜滩[4]圪几盖滩[5]拉拉堡[6]白牛滩。 Fig. 2 Note:[1]-[6]are the villages during Kangxi Emperor period:[1]Zhanggaijie[2]Jinji-tan[3]Liubu-tan[4]Qijigai-tan[5]Lala-bu[6]Baisheniu-tan

图3注:[1]-[2]为乾隆年间所建村庄:[1]段家伙场[2]榆树湾;(1)-(5)为嘉庆年间所建村庄:(1)西窑则(2)南湾(3)羊脑滩(4)张寺梁(5)王家伙场。 Fig. 3 Note:[1]-[2]are the villages during Qianlong Emperor period:[1]Duanjia-Huochang[2]Yushu-wan;(1)-(5) are the vil-lages during Daoguang Emperor period:(1)Xiyaoze(2)Nangua(3)Yangnao-tan(4)Zhangjialiang(5)Wangjia-Huoc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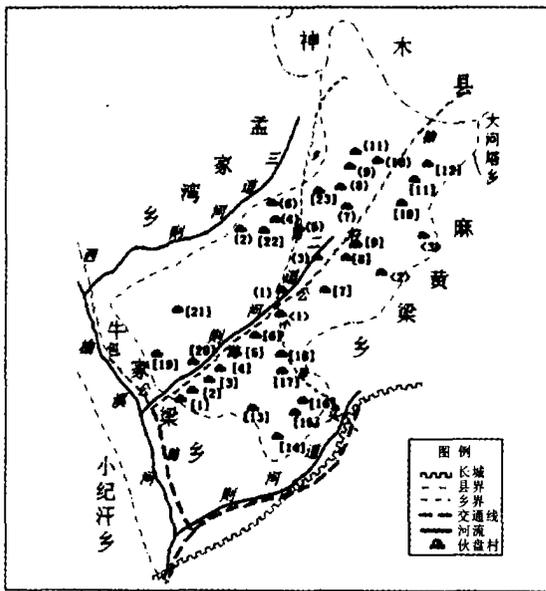


图4 道光至同治年间金鸡滩乡村落分布示意

Fig. 4 The sketch map of village distributings from Daoguang Emperor period to Tongzhi Emperor period

图4注:[1]-[23]为道光年间所建村庄:[1]张家伙场[2]上河村[3]叶家伙场[4]王家伙场[5]尤家伙场[6]曹家伙场[7]米家伙场[8]白家伙场[9]王家伙场[10]小滩子[11]曹家滩[12]张家伙场[13]井则湾[14]西张牛村[15]东张牛村[16]大梁湾[17]西掌盖界[18]东张盖界[19]薛家庙滩[20]罗家伙场[21]海流滩[22]蒋家伙场[23]刘家伙场;(1)-(11)为咸丰年间所建村庄:(1)阎家伙场(2)任家伙场(3)马圈沟(4)蒋家伙场(5)吴家伙场(6)纪家伙场(7)李家伙场(8)曹家伙场(9)杜家伙场(10)郝家伙场(11)上张家伙场;<1>-<3>为同治年间所建村庄:<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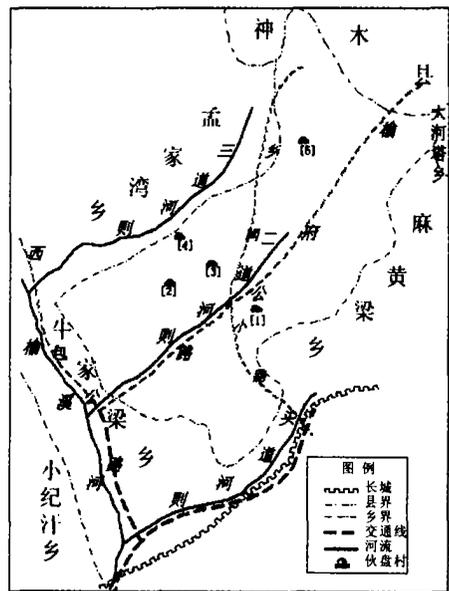


图5 光绪至宣统年间金鸡滩乡村落分布示意

Fig. 5 The sketch map of village distributings from Guangxu Emperor period to Xuantong Emperor period

周纪伙场<2>杜家海子<3>大海则湾。Fig. 4 Note: [1]—[23]are the villages during Daoguang Emperor period: [1]Zhangjia Huopan [2]Shanghe [3]Yeja Huopan [4]Wangjia Huopan [5]Youjia Huopan [6]Caojia Huopan [7]Mijia Huopan [8]Baijia Huopan [9]Wangjia Huopan [10]Xi-aotanzi [11]Caojia-tan [12]Zhangjia Huopan [13]Jingze-Wan [14]Xizhanniu [15]Dongzhangniu [16]Daliang-Wan [17]Xizhanggaijie [18]Dongzhanggaijie [19]Xujiamiao-Tan [20]Luoja Huopan [21]Hailiu-Tan [22]Jiangjia Huopan [23]Liuja Huopan: (1)–(11) are the villages during Xianfeng Emperor period: (1)Yanjia Huopan (2)Renjia Huopan (3)Majian-Gou (4)Jiangjia Huopan (5)Wujia Huopan (6)Jijia Huopan (7)lijia Huopan (8)Caojia Huopan (9)Dujia Huopan (10)Haojia Huopan (11)Shangzhangjia Huopan; <1>—<3> are the villages during Tongzhi Emperor period: <1>—<2>Zhouji Huopan <2>Dujia-Haizi <3>Dahaize-Wan.

图 5 注: [1]—[5]are the villages during Guangxu Emperor period: [1]Ma-Huochang [2]Yuanwa-tan [3]Zhao-Huochang [4]Yangzheng-tan [5]Xiaofen-tan

## 2.2 明末清初的封禁期

明代末年, 由于蒙古封建主之间的混战和清政府对蒙古各部的征战, 蒙古牧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普遍下降, 牲畜大量削减, 蒙古地区内部呈现出衰落景象。有人曾做统计, 伊克昭盟地广人稀, 明末清初之际, 蒙民不足四万户, 人口仅为 19.2 万, 人口密度为 0.33~0.34 人/km<sup>2</sup>[6]。此外, 明末农民起义失败后, 有一部分越过陕北长城, 继续进行抗清活动[7]。故而, 清政府出于“休养生息”、“蒙汉隔离”的实际需要, 于顺治年间在蒙陕农牧交错带沿长城外侧划定一条宽 25 km, 长 1000 km 的“黑界地”, 而金鸡滩乡包含其中。在此期间, 内地农民多从事对原有荒芜土地的复垦, 因此, 虽有一些无地、少地农民违反清政府禁令, 进入伊克昭盟进行私垦, 但为数有限, 不足以改变当地畜牧业经济的主体地位。

## 2.3 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六年(公元 1697~1741 年)的招垦期

如前所述, 零星农民的私垦活动为数有限, 但是他们的农业产品却得到牧民的普遍欢迎, 以至康熙三十六年(公元 1697 年), 伊盟盟长松拉普奏请康熙帝“乞发边内汉人, 与蒙古人一同耕种黑界地”。清政府经过权衡利弊得失, 做出决定, 凡是“有百姓愿出口种田, 准其出口种田, 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 或蒙古欺压民人之处, 即行停止”。新诏令的颁布, 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移民垦殖的存在。而金鸡滩乡距边墙较近, 交通便利, 地下水资源相对丰富, 土地状况相对良好, 自然成为移民所关注的对象, 以至此时期有六处伙盘地村落在这里相继建成, 如图 2。在这六处伙盘村中, 金鸡滩、柳卜滩、拉啦堡、白牛舍牛滩多为土地相对状况良好的下湿滩地和干滩地。据统计, 这六处村落虽仅占该区在清代所建村落的 10.9%, 但此后各时期所建村落都以这六处伙盘村为基础。在康熙年间, 这几处村落只是零星地点缀在蒙古游牧地, 成为当地游牧经济的附属。

## 2.4 乾隆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742~1902 年)的禁垦期

此时期始于乾隆七年, 止于光绪二十八年, 历时

近 160 年。其可分为两个阶段, 即乾隆七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公元 1742 年—1820 年)和道光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821~1902 年)。第一阶段, 由于招垦期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 一些适宜于放牧的草地也被陆续开垦, 这促使蒙汉民之间的矛盾凸露出来, 故而清政府对伙盘地移民的垦殖活动进行调整。乾隆七年(公元 1742 年), 贝勒扎木扬等请驱逐界外移民, 清政府派尚书班第、总督庆复会同盟长定议, 对这一地区进行重新界定并颁布禁垦令。因此, 在此阶段, 虽有一些汉族移民违抗禁令, 继续向乾隆年间所规定的界线外垦殖, 但数量有限, 以金鸡滩为例, 该乡在乾隆、嘉庆年间相继出现 7 处伙盘村落(如图 3 所示)。这 7 处伙盘村都是围绕康熙年间的六处伙盘村或近或远的分布, 它们的分布实际上仍是以占有土地状况较好的草滩地为核心的。据调查, 今天的王家伙场、段家伙场和榆树湾仍是金鸡滩乡的主要粮食作物产地。由此可见, 在清代, 这里的土地状况应该是相对较好的。不过, 从伙盘村的数量上, 我们仍可以看到, 清政府的封禁政策限制了伙盘地村落的大规模出现。移民聚落的零星分布, 使得这里的土地垦殖受到局限, 原有的游牧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第二阶段据史料载,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 1841 年)前后, 伙盘地的地域范围除神木县、怀远县口外存有越出乾隆年间所勘界线的行为外, 其余四县口外均未出现大规模的越界现象。移民把重点主要放在对已放垦土地的垦殖上, 因此, 金鸡滩乡的耕地面积在此时期出现稳步增长现象。同时, 移民对蒙古贵族的依附关系减弱, 甚至蒙古贵族将土地长期承租给汉民, 以至最后难以收回, 这就引发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如据榆林镇城口外蒙地的档案记载, 自嘉庆年间至民国初年, 该处土地的使用权经历了至少五次以上的流转。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一方面使蒙古贵族大为不满, 而更具深远意义的是, 土地使用权的转移意味着汉族移民掌握了对土地利用的优先权, 自然的, 农业区的拓垦渐成规模, 游牧经济的主体地位逐步向半农半牧状态过渡。据统计, 道光年间先后有 23 处村落建成,

咸丰年间则有 11 处村落建成,而同治年间亦有 3 处村落建成(图 4)。

至此,自康熙中叶至光绪年间,共建成村落 50 处,占到清代所建村落的 90.9%。金鸡滩乡的农牧业比重发生明显变化。汉族移民在原本属于蒙古族的游牧地相继建立村落<sup>[8]</sup>。

## 2.5 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的拓垦期(公元 1903~1911 年)

光绪末年,清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事实上

已经等于废除了“蒙禁”政策,而且此后的一系列政策均在鼓励内地汉民向蒙古腹地迁移。在此形势下,清政府终于在 1910 年正式宣布废除对蒙古地区的一切禁令。而金鸡滩乡由于可耕地已经不多,因而,此时期的伙盘村数额并未因政策的放宽而大量增加,在此期间共有 5 处伙盘村相继建成,它们分别是小坟滩、杨正滩、赵伙场、袁瓦滩和马伙场(图 5)。可以说,金鸡滩乡在清代末年已经趋于饱和。此时期的土地开垦量也逐步稳定下来,如表 2。

表 2 金鸡滩乡伙盘地村落土地状况

Table 2 Land status of HuoPan land at JinJiTan

堡属 Location	村庄 Village	住户 Residence (户, home)	土地 Land(667m <sup>2</sup> )		开放年代 Time
			滩地 Bottomland	沙地 Sandy land	
镇城口外 Zhencheng	元娃滩 Yuanwa beach	8	480	500	乾隆年间 Qianlong Emperor
	杨正滩 Yangzheng beach	4	45	45	
	海流滩 Hai Liu beach	18	180	180	
常乐堡口外 Changlebao	长盖界 Zhanggaijie	5	60	100	康熙年间 Kangxi Emperor
	金鸡滩 Jinji beach	30	1050	1500	
	柳卜滩 Liubu beach	15	220	200	
	圪几盖滩 Qijigai beach	7	285	320	
	白牛滩 Baisheniu beach	17	510	1200	
双山堡口外 Shuangshanbo	那拉补 Lalabu	5	30	50	康熙年间 Kangxi Emperor

表 2 所涉及到的“掌盖界”、“金鸡滩”、“柳卜滩”等村落多是典型的伙盘村。这些村落的土地类型大致有两种,即滩地和沙地。滩地四周略高,中部低平,地下水资源丰富且埋藏浅,农作物产量相对较高<sup>[9]</sup>。而沙地的土壤成土母质为沙蒿芥和黄沙土,沙蒿芥是指固定和半固定沙丘的土壤类型,这种土壤的土层表面可生长沙米、沙蒿、沙竹和臭柏等禾本科植物,它的植被覆盖度为 40%~60%。在这些地方进行农业生产所得到的收益是很低的,一般只有 225~375 kg/hm<sup>2</sup><sup>[10]</sup>。黄沙土则多为固定沙地,它的肥力状况比沙蒿芥好,土层内含土量较多,但质地较粗,结构松散,保水保肥力弱,不耐寒,只适合种植一些耐旱、耐瘠的作物。

总之,榆林金鸡滩乡在近 200 余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由单一的游牧景观向农业景观的过渡。在此期间,由于中央政令的反复,蒙古贵族的影响,汉族移民的努力,金鸡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农业开发,同时也带来了当地土地资源的破坏。许多草地因农业开发而失去大量的优质土层。在缺少地面植被掩护的情况下,这些土壤受到强劲风力的袭击,以风沙为主的自然灾害愈演愈烈,损坏农田,掩毁村庄。下湿滩地缩

小,丘间洼地盐碱化加剧,局部沙流已进至黄土梁峁之上<sup>[11]</sup>,不过,这种土地垦殖方式、力度的变化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变化在清代呈现为较平缓的发展态势。

## 3 土地垦殖的空间差异

土地垦殖是以农业生产为目的,农业生产又深受自然环境差异的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土地垦殖上即表现为:自然条件较好、宜于耕种的地域,土地垦殖早而强;反之,自然条件较差、不易于耕种的地域,其垦殖晚而弱<sup>[12]</sup>。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北缘及东部为沙丘与湖盆滩地交错带,滩地中部平坦,常有湖泊零星分布;东部和东南边缘主要是覆盖着薄层片沙的黄土梁地;西部由于无流或内流,土壤盐渍化严重。由该区域地貌类型的分布特征所形成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地域差异,决定了本区土地垦殖必然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

查阅相关文献,发现缺乏直接反映清代不同历史时期关于陕北沿边六县口外边地耕地数额的资料,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沿边六县口外边地不同历史时期的村庄分布情况对本区的土地垦殖情况进行推算,如表 3。

表 3 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村庄分布情况

Table 3 The village distribution of HuoPan land at the outside of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 of Shaanxi in the Qing Dynasty

时期 Time	榆林县 Yulin	横山县 Hengshan	府谷县 Fugu	神木县 Shenmu	靖边县 Jingbian	定边县 Dingbian
康熙 36 年 the 36 <sup>th</sup> year of Kangxi Emperor	95	108	234	134	245	180
雍正 8 年 the 8 <sup>th</sup> year of Yongzheng Emperor	—	—	—	21	25	—
乾隆 8 年 the 6 <sup>th</sup> year of Qianlong Emperor	42	45	165	111	—	100
道光 18 年 the 18 <sup>th</sup> of Daoguang Emperor	—	49	—	—	—	—
光绪 28 年 the 28 <sup>th</sup> of Guangxu Emperor	67	18	79	51	—	37
总计 Sum total	204	220	478	317	270	317

据民国《陕绥划界纪要》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康熙年间,在陕北沿边六县长城外伙盘地中,出现村庄数最多的为靖边县伙盘地,该县伙盘地村庄占到了该县在清代所建村庄的 90.7%,最少的如神木县伙盘地,也占到 42.3%,其余四县大致维持在 46.6%~56.8%之间。康熙年间以后,清政府自乾隆年间至光绪末年的 150 余年中一直推行禁令,严令禁止汉民流入蒙古地区,陕北长城外地区自然也在封禁之列。但山陕边民仍然违抗禁令,闯入黑界地从事农牧活动。这一时期共有 512 村建成,其村庄数额相对较少,自然与政府禁令有关。至光绪末年,“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直接导致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移民垦殖出现新的高潮。此时期建村不多,但开垦的土地数额确实相当惊人<sup>[13]</sup>。

从生产工具的简易程度来看,汉族移民的生产工具只有铍、土犁、钉齿耙、镰刀、锄等简单工具<sup>[14]</sup>。这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对地表的破坏相对较小,以土犁为例,土犁的铧为铁制,呈圆盘状,一般耕层为 4 寸,以人一手扶犁,一手赶牛,自晨至午,可耕种 0.2 hm<sup>2</sup> 左右。而有的地方,只有耒耜等简单工具。耒耜是一种尖头木棒,在距尖端不远的地方加上一短横木,供脚踏之用。耒耜的使用所带来的影响只是对表土浅层的不规则利用,尚不及土犁。从农业生产方式的地域差异来看,虽然伙盘地居民多以撂荒生产为主,但由于地域特点的不同,陕北长城外伙盘地所采用的耕作制度也存有一定差异。如神木县、府谷县边外伙盘地居民便采用与轮闲耕作制相近的“倒山种田”撂荒耕作,即在一块土地上耕种 2~3 年,撂荒(弃耕)2~3 年,以增加土地肥力。而像定边县的八里河灌区与靖边县天主教农作区,这里的

居民引水溉田,进行水浇地农作,成为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农业中的典范。

#### 4 几点认识

1) 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土地垦殖可分为 4 个阶段:即明末清初的封禁期、康熙三十六年至乾隆六年的招垦期、乾隆七年至光绪二十八年的禁垦期和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的拓垦期。大致从康熙中后期开始,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出现一定规模的汉族移民聚居点,道光至同治年间出现土地垦殖的高峰。

2) 土地垦殖在地域上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与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密切相关。就土地类型而言,陕北长城外伙盘地清前期是以下湿草滩地为主,中期以下湿草滩地、沙地居多,晚期则以沙地为主。就土地垦殖力度而言,在草滩地、干滩地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往往出现精耕细作的现象;而在以固定、半固定沙丘为主的沙地上,则以撂荒生产为主。

3) 粗放的土地垦殖方式使得地表出现不同程度上的破坏,特别是在休耕期,由于没有播种绿肥作遮盖物,一遇暴雨冲洗或狂风吹刷,上层细土即被洗去或飞扬。惟粗砂尚存地面。但就整体而言,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土地垦殖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变化在清代呈现出较为平缓的发展态势。

4) 深入、细致地分析一个地区土地垦殖过程及其时空特征,对复原历史时期该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存有重要意义。它既有助于探讨该地区在没有显著人类活动的自然条件下的生态环境、过去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对这一生态脆弱带的影响等问题,同时也对理解西部生态环境的

自然潜力、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承受能力、区分自然和人为因素对西北环境的可能后果提供支持。

**致谢:** 本文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侯甬坚教授指导下完成,特此致谢。

#### 参考文献:

- [1] 傅伯杰、陈利顶,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过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2] 蔡运龙.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寻求新的综合途径[J]. 地理研究,2001,20(6):645—652.
- [3] 赵哈林,周瑞莲,张铜会,等.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草地植被类型、特征及其生态问题[J]. 中国草地,2003,(3):22—28.
- [4] 吴 薇. 近50年来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过程研究[J]. 中国沙漠,2001,(2):164—169.
- [5] 榆林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 金鸡滩乡志(内部资料). 榆林:县档案馆,1988.

- [6] 成崇德. 清代前期蒙古地区农牧业发展及清朝的政策[J]. 清史研究,1991,(2):57—60.
- [7] 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 榆林市志[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 [8] 榆林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 陕西省榆林县地名志(内部资料). 榆林:县档案馆,1988.
- [9] 西北大学地理系《陕西农业地理》编写组. 陕西农业地理[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 [10] 陕西省农业勘察设计院. 陕西农业土壤[M]. 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 [11] 雷明德,等. 陕西植被[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 [12] 何凡能,田砚宇,葛全胜. 清代关中地区土地垦殖时空特征分析[J]. 地理研究,2003,(6):687—697.
- [13] 王 晗. 清至民国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土地状况——以定边县、靖边县为例[A].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 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C].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277—285.
- [14]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reclamation in HuoPanDi at the outside of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 of Shaanxi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Han

(Institution of Northwestern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numerable and valuable historical documents,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reclamation in Huo PanDi at the outside of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 of Shaanxi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 ① four stages of the land reclamation in HuoPanDi at the outside of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 of Shaanxi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identified, i.e., the stage of desolation in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tage of recultivation from the 36th year of Kangxi Emperor to the 6th year of Qianlong Emperor, the stage of expanding reclamation from the 7th year of Qianlong Emperor to the 28th of Guangxu Emperor, and the stage of desolation from the 28th year of Guangxu Emperor to the end of Xuantong Emperor. The arable lands were reclaimed up 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began to live by the later stage of Kangxi emperor. The interdiction during the time of the next emperors (Qianlong, Jiaqing, Daoguang, Xianfeng, Tongzhi and Guangxu) kept on enlarging the farm-land and brought it to the “peak” level in the reign of Daoguang and Guangxu emperors. ② The land reclamation is spatially imbalanced due to environ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early stage, the recultivation concentrated in the meadow areas. In the mid-stage, the reclamation expanded in meadow and tibba areas. In later stage, the reclamation activities moved back to tibba. A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meadow areas with better natural conditions had a low ratio of desolation, a high ratio of recultivation and a quick process of recultivation. The tibba areas had a high ratio of desolation and the intensity of reclamation there was much high.

**Keywords:** Qing Dynasty; outside of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 of Shaanxi; reclamation land;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Jinjitan